

银川打造特色“塞上枫桥”人民调解品牌

本报讯（记者 杨秀丽）近年来，银川市司法行政系统多举措打造具有特色的“塞上枫桥”人民调解品牌，以实际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银川市司法局建立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指导建立“一站式”调解中心，协调化解本地区跨乡镇（街道）、跨部门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或其他重大矛盾纠纷。各乡镇（街道）依托综治中心或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设立一站式调解中心，聘请专职调解员负责

引导、分流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诉求，提供一站式调解服务，化解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截至目前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309个。

积极对接法院系统，发挥“社区微法庭”作用，成立法官社区工作室，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审判有效结合；与人民法院建立诉前委派、诉中委托人民调解参与司法调解工作制度，联合挂牌成立“审务工作站”，深入推进“司法所+法庭”的联动调解模式，形成“一镇（街）、一庭、一站”的纵向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审

务进基层全覆盖。联合公安、信访等单位，形成“司法行政+X”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依托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等，统筹律师、法律援助、公证等专业力量，形成“人民调解+X”工作机制，激发多元调解内生动力。

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提档升级，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组织网络。建成了一批以“老王说和室”等为代表的特色调解工作室，率先成立全区首家知识产权纠纷社会组织调解委员会和银川市首

家律师事务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律师等社会专业人士以及信访等部门退休人员中选任人民调解员，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员工作多元化水平。全面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专项行动，对排查出的纠纷和隐患及时梳理化解并逐级上报，实现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去年以来，银川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29718次，调解矛盾纠纷6263件，调解成功5999件，调解成功率96%。

我区药品监管守正创新擦亮法治底色

（上接01版）

持续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购置配发行政执法记录仪30部，执法终端62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率达100%。推动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药品监管依法行政体系。

“放管服减费增效”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启元药业是我区药品生产企业中的龙头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至今，在我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降低50%”的政策红利下，节省产品注册费用95.5万元。据统计，自2020年1月1日我区实行该项政策红利3年来，累计减免企业产品注册收费248.4万元。

“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药品监管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法治政府创建的足音铿锵：实施“证照分离”改革，推行“清单式”管理、“一站式”服务，将执业药师注册等42个常办事项上线“我的宁夏”政务APP场景，目前区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0%以上；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开辟“绿色通道”、采取“容缺办理”等形式，最短时间内为全区4家企业6个产品办理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手续；历时4年，集中打造集行政审批、日常监管和检验检测等九大功能于一体的宁夏药品智慧监管平台，实施“阳光药店”工程，全区“阳光药店”覆盖率达到92.5%，疫苗追溯系统与自治区卫健委有关系统实现组网，地产中药饮片可追溯系统与阿里云“码上放心”平台实现对接，智慧药监模式进入新时代；联合自治区发改委印发《宁夏药品生产经

营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办法》，开启宁夏药品信用监管新模式。截至2022年底，全区共建立“两品一械”企业药品安全电子信用档案4829份，建档率达87.2%，372家企业因违法违规受到信用记分，信用等级评定率100%。

“宽严相济” 执法力度与温度并存

2021年10月，自治区药监局向平罗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线索：平罗县某医院未充分履行进货相关手续，导致相关药品无法溯源。经查证，该院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购进的货值48万多元中药饮片不能提供合法来源。平罗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处以没收违法购进的中草药饮片、没收违法所得472329.77元、罚款967323.78元的行政处罚。

2022年，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先后查处“两品一械”行政违法案件775起，办理区外协查线索22件；先后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刑线索12条，向卫健、医保等部门移交线索11条，全区查办涉药违法案件数量实现3年连增。自治区药监局开展落实的“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和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分别被评为2020年、2022年全区“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区药品安全群众满意度逐年递增，未发生重大行政决策失误，无行政复议案件。我区出台《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责任约谈办法》，先后约谈生产经营企业20家次，按照“首违不罚”原则对4家企业轻微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罚，包容审慎的执法新模式正在形成。

宁报集团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热线

0951-6019493(机关纪委) 0951-6033843(全媒体指挥中心)

马宏雄：热心调解守护安宁

本报记者 刘炳宇 文/图



马宏雄（左一）查询基层治理摸排数据。

“政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心系群众、真情付出，就是要帮助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化解矛盾纠纷隐患。”2月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固原市将台堡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宏雄如是说。

将台堡镇明荣村村民田某、樊某夫妇婚后育有三个孩子，由于夫妻二人年龄相差较大、生活方式不同，经常发生争执。去年1

月，马宏雄听说田某扬言要对樊某全家进行报复，他第一时间联系镇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入户给田某做工作。马宏雄对田某说：“冲动行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还有孩子和自己的生活。”在他的多次劝解下，田某逐渐冷静下来，也认识到自己和樊某之间的婚姻难以维系，表示将按照法律程序起诉离婚。随后马宏雄联系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共同帮助田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同年3月，法院作出判决解除了二人的婚姻关系。

将台堡镇崔中村女子马某以患有眩晕症和孩子的父亲不履行法院判决为由，多次来镇上反映情况。马宏雄得知情况后，及时将马某反映的事项列为重要工作日程，组织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进行全面核实、分析研判，提出化解方案。马宏雄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到马某家走访。通过唠嗑，马宏雄了解到马某无固定工作，家庭生活困难。随后，积极联系该镇民政助理员，为马某母子办理了农村低保，并联系相关企业每年为马某的儿子提供学业资助。对于马某所反映事宜，马宏雄及时组织调解，最终成功化解。

在工作中，马宏雄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任劳任怨。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做好登记、接待、交办、督办、协调等各项工作。2022年，马宏雄共排查矛盾纠纷149起，矛盾化解率100%。

乡镇工作虽然繁杂，但马宏雄却觉得很充实，他说：“我始终相信，积少成多，量变最终产生质变，我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上的每一个踏踏实实脚印，都会凝结成推动整个基层治理向更加完善、更加规范、更加人性化迈进的动力。”

首席编辑 倪 慧 版式设计 朱玉华 校对 倪 慧

法报纪检

本报记者 张剑波

背靠“大树”吃四方、居中斡旋当“掮客”……多地通报“寄生性”腐败案件 切断利用职务影响力谋私贪腐链条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日前被提起公诉，通报提到其“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明被“双开”，通报指其“大搞家族式腐败，肆无忌惮，为亲属入职金融系统、开展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纵容甚至帮助亲属进行违纪违法活动”……在近期公开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多名领导干部涉及亲属利用其影响力谋私贪腐的问题。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这一问题有何表现和特点？如何精准查处此类问题？

弟弟仗着哥哥的影响力承揽工程大吃四方，司机仗着领导的影响力充当“掮客”

2月8日上午，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原主任阳卫国涉嫌受贿罪一案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阳卫国曾任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株洲市委副书记，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长等职务。据检察机关指控，阳卫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房地产项目开发、干部提拔任用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其胞弟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722.2万余元，其中未遂820万元。

“在我的违纪违法犯罪事实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我的两个弟弟。”2006年，阳卫国到株洲任职后，二弟欧阳卫民以小孩读书为名，举家从长沙搬到了株洲。欧阳卫民开了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尽管起初无技术、无资金、无队伍，但背靠哥哥这棵“大树”，欧阳卫民得到了老板们的特别关照，陆续承揽工程项目，在株洲大吃四方。

起初，阳卫国还有所顾忌，对阳卫民的行为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一长，他一步步丧失原则，后来甚至亲自上阵，直接给有关部门和领

导打招呼，帮弟弟赚得盆满钵满。

阳卫国的三弟原是湖南省衡东县生态环境局的的工作人员，有一份稳定工作和收入。看到二哥赚了钱，他心态开始失衡，也来到株洲“投奔”，借大哥的影响力发不义之财，上演了和二哥哥类似的“戏码”。

阳卫国的纵容和站台，“吸引”更多亲戚闻风而动，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一时间，株洲各个市市区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上，到处活跃着阳卫国家人们的身影。

一开始为家人撕开小口子，被欲望的洪流一步步冲大，最终成决堤之势——全家多人涉案、兄弟三人几乎同时身陷囹圄，这是阳卫国追悔莫及的家庭悲剧。

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谋私贪腐，涉案主体不只包括配偶、子女、兄弟等亲属，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下属、朋友等特定关系人也常牵涉其中。浙江省江山市上余镇党委书记周建慧案就是其中一例。

早些年，周建慧根据组织安排，到江山市贺村镇任党委副书记。贺村镇的司机宁某此前就与周建慧有交情，此时更是察言观色、鞍前马后，逐渐得到信任，成了周建慧眼中的“自己人”。

2015年下半年，某建材公司老板想将其预购的贺村镇一块工业用地转让他人，但审批环节遇到困难。而周建慧当时分管工业，掌握着审批权。

“这位老板知道宁某与周建慧关系很好，便请托宁某出面，找周建慧帮忙。”据办案人员介绍，经周建慧联系，这块地顺利转让给他人，该老板还从中赚了15万元转让费，便送给宁某7.5万元的好处费，而宁某随后就给了周建慧3.5万元。

解决建房审批、在辖区内办夹石场、承接工程项目……就这样，宁某在前端当“掮客”，周建慧负责办妥请托事项。在一次次“合作”中，两人结成的利益共同体越发牢固。在周建慧的犯罪事实中，其伙同宁某收受他人财物达68.3万元。

“起初心里也有顾虑，但感觉宁某

可靠，就用‘自己给对方办成了事，对方是为了表示感谢’的理由麻醉自己，心安理得被‘围猎’。”周建慧说。

2022年4月，周建慧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8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宁某等相关涉案人员也已被另案处理。

利用影响力搭建隐秘的利益输送链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举行发布会披露，从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情况看，当前腐败犯罪呈现出领导干部亲属“寄生性”腐败犯罪层出不穷，家族式腐败问题日渐突出等新特点。

“如果把领导干部自身腐败称为‘原发性’腐败，那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等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影响力谋私贪腐可看作是‘寄生性’腐败。”江山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在周建慧案中，宁某本身并无权力，他利用的是领导的职权影响力。而请托人、行贿人看中的也正是他与领导的关系，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围猎”，间接达成目的。

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除了充当“掮客”，以居中斡旋、提供帮助、与他人合作等方式谋利外，领导干部的影响力还会被用来搭建隐秘的利益输送链条。

有的损公肥私，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行政审批等领域利用公共资源非法牟利。比如，为了帮二弟胡向阳赚快钱，湖南省醴陵市委原书记胡湘之找来几位老板，承诺“你帮我弟弟，我来帮你”；侄子胡锦文则依靠胡湘之的影响力或者让他出面打招呼，从各类工程项目中捞取利益。

有的损人利己，为自己的业务或公司经营活动不当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副局长蒋培言的侄子蒋某军在富阳区成立了一家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利用蒋培言的职务

影响力“脱颖而出”，屡屡成功承接房产弱电工程项目。

“综观身边人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进行违纪违法活动的案例，许多情况下领导干部并非没有察觉。他们有的袖手旁观，默许纵容亲属打着其‘代言人’的旗号找到相关人员要求给予关照；有的直接‘出马’，按照亲属的请托向下属或相关单位打招呼。”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建龙说。

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的本质是让公权异化为私器，利用职位权力带来的溢出效应以权谋私

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主动“搭台”，授意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唱戏”。他们或是隐身幕后当“影子”老板，为亲属疏通关系，亲属再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职务影响力聚敛财物；或是演“双簧”，领导干部授意有关个人或单位，“照顾”亲属的公司，再与其共同敛财，自认为如此一来能更加安全隐蔽。

“近水楼台、前官后商。”重庆市九龙坡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陈清露告诉记者，从该区近年来查处的国企负责人案件来看，“影子公司”“影子交易”等新型腐败手段成为以权谋私的新手法。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在相关企业深耕多年，深谙行业经营之道，让亲友利用其职权和长期积累的人脉资源成立“影子公司”，紧紧依附国有企业的产、供、销环节，开展同类关联交易。亲属通过此类“同款”经营，获取国企的“特殊关照”和“定点输送”。

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相关工作，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截断影响力“变现”渠道。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对常态化管理的政策措施和纪律要求予以明确。



影响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公权力的体现和延伸。“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的本质就是让公权异化为私器，利用职位权力带来的溢出效应以权谋私。”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唐德俭说，领导干部的影响力通过违规干预、请托办事、谋求特权、捞取好处等违纪违法行为“变现”，影响力从而异化为破坏力，不仅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还侵害了党员干部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乃至一个系统的政治生态。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其身边人，涉及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都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7条规定：“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刑法第388条之一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出了明确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也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原有的

职权和地位还会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本身及其身边人，都可能因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而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唐德俭说。

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切断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链条

“亲属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力谋私贪腐，有一个很突出的要素就是权力被亲情所绑架。”陈建龙说，在厦门市思明区纪委监委查办的案件中，某些领导干部受成长经历或思想观念影响，觉得自己应该“帮”亲属，然而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用权力来弥补亏欠，用公利为私欲买单。

把单纯家庭关系演变成通谋腐败的利益关系，折射出的是权力观、亲情观的错位。“亲情扭曲，是我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推手。”阳卫国忏悔道，随着职务不断晋升，“报答亲情”的想法慢慢扭曲，加之自身不正、丧失原则，也给弟弟们树立了坏榜样。

领导干部失察失管，是其亲属和身边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重要原因。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督促领导干部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切断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的链条。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